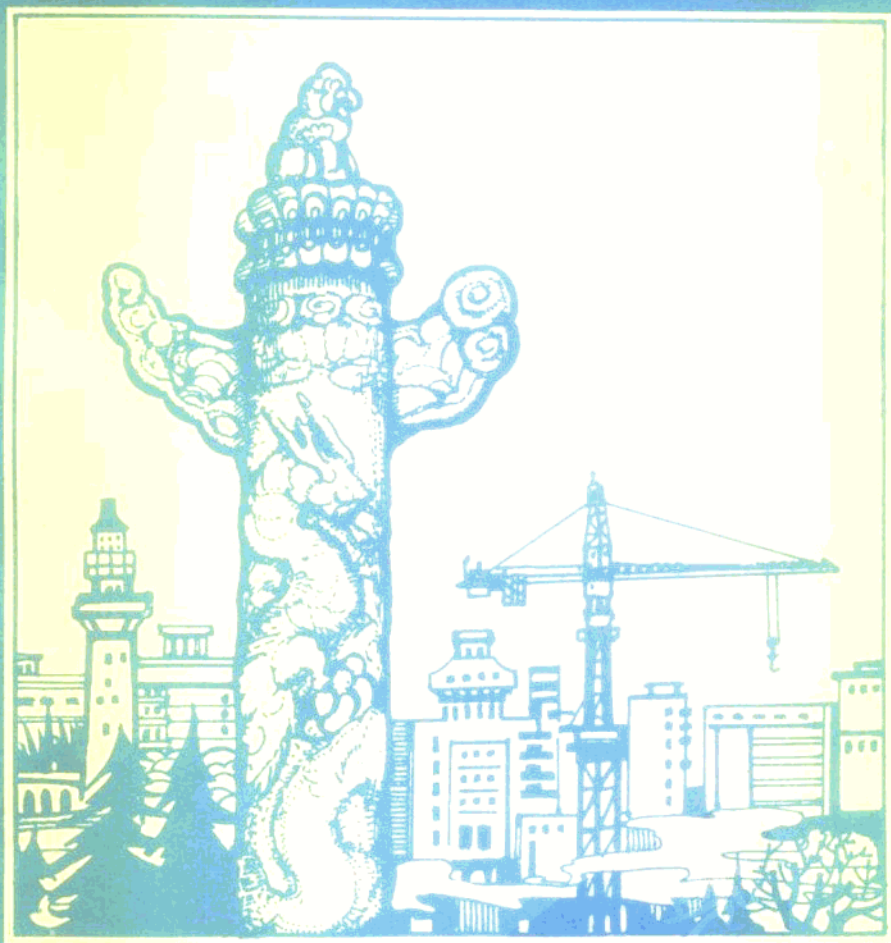


苏联人看中国



《参考消息》编辑部编



415

《参考消息》专辑之二十

苏联人看中国

主 编 杨放农

责任编辑 陈建章 韦政强



新华通讯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

一九八六年十月

编 者 的 话

自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苏联报刊不断发表文章，评论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本专辑选登的文章，是从一九八五年七月到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间发表的文章，作者有曾来华访问的苏联党政高级官员、著名学者、记者等。这些文章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对我国四化建设和改革的一些基本看法。

在这些文章中，多数对我国的建设和改革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而且随着中苏关系的发展，有些文章还对我国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作了正面肯定。但是，也有一些文章对我国的政策有所曲解，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对我国进行攻击。我们搜集苏联报刊中有关的反映各种论点的文章，编辑和出版这本专辑，是为了帮助有关研究人员和读者全面了解苏联对我国建设和改革的看法和态度。

文内的中国人名，有些难于查对，只得译音；有些引语，因原文未注明出处，不易核对，只能采取意译；望读者见谅。至于译文和编辑工作中的缺点和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指出，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中国学者谈中国建国后中共党史问题·····	伊帕托娃 (1)
中国：经济生活的问题·····	阿加福诺夫 (9)
三十年后的中国·····	奥夫钦尼科夫 (12)
睦邻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托尔库诺夫 (17)
中国的经济特区·····	波尔佳科夫 斯捷潘诺夫 (21)
在平等与互利的原则上·····	阿尔希波夫 (30)
变化的特征·····	戈德纳 (35)
中国研究苏联的中心·····	费奥多罗夫 (39)
中国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组织体制的变化·····	萨拉法诺夫 (44)
苏联与中国的贸易经济关系·····	库兹涅佐夫 (53)
中国第六个五年计划的结果与问题·····	斯捷潘诺夫 波尔佳科夫 (61)
中国经济改革座谈会·····	费·布尔拉茨基 (75)
今日中国——探索的时代、希望的时代·····	阿尔斯拉诺夫 (84)
北京的盛夏·····	库兹涅佐夫 (87)
探索在继续中·····	雅科夫列夫 (92)
浙江行·····	阿尔斯拉诺夫 (96)
中国发展多种成分的经济结构·····	科尔巴什 (101)
从卫星到玩具·····	巴拉赫塔 切巴科夫 (105)
中国：显著的变化·····	巴拉赫塔 (107)
上海面面观·····	通贝格 (110)
苏联——中国：合作的潜力·····	塔雷津 (112)
秋天的特征·····	萨文科夫 (114)
解决重要的任务·····	鲍里索夫 (116)
外籍华人和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计划·····	贡恰罗夫 (120)

中国学者谈中国建国后中共党史问题

历史学副博士 伊帕托娃

自一九八〇年起，中国开始出版多种《中共党史讲话》教材，供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使用。这类《讲话》分一卷和二卷出版，由若干省市高等学校专门组成的小组集体编写。截至目前为止，这类《讲话》已经出版了近二十种。照例，这些《讲话》都在不断修订，并且已经出了第三版或第四版。

就我们所见到的几种《中共党史讲话》来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中共党史，整个都是按照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九八一年六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官方说法编写的。在大多数《讲话》的序或跋中都强调指出，这些《讲话》或是根据六中全会的《决议》精神，或是在六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编写的。此外，编者还指出，在编写《讲话》时利用过一些非公开出版物，如《中共党史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大事记》以及一些不再保密的文件和材料，这类文件和材料的一部分前些年在红卫兵的刊物上或在台湾和香港的出版物上披露过。

翻阅我们拥有的一些《讲话》教程，我们发现这些《讲话》都带有一种叙述和罗列事实的性质。这些《讲话》中的中共党史，都是按编年顺序罗列的主要事件和党采取的措施。一些新的从前未发表过的现已普遍采用的党的文件、事实和事件都没有指明出处。在大多数情况下，介绍情况的资料居于主要地位，这些资料照例仅仅反映出党的活动形式，而不能揭示党的状况和发展。举例来说，没有分析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构成和年龄构成，没有分析党的发展情况等等。

尽管在《讲话》中没有专门探讨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共党史的分期问题，但是章、节划分包括了一定的编年时期，并表明在《讲话》中对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党史的分期，基本上是按照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划分的。

第一个时期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这一时期叫做“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一九五

七年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讲话》中把这一时期叫做“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从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个时期是从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今，叫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的新时期”。中共党史每一个大的时期中还有更细的分期。例如，在《讲话》中把第一个时期又细分成两个时期：“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时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

《讲话》在确定一九四九年十月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时，仍然保留着五十年代中国官方历史文献固有的不一致的提法。这场革命被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叫做“人民民主革命”，“民主革命”，“人民革命”。在《讲话》的一种本子里还把这场革命定为“民族民主革命”。但是，对那个时期中国革命进程的性质和内容的此类定义，只是根据革命推动力量的广泛范围作出的。同时，作者们认为，在革命期间无产阶级在力量上和人数上都超过了民族资产阶级，正是这一情况帮助无产阶级轻易掌握了领导权。

所有《讲话》都认为，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发生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转变。

根据这一结论（和根据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评价的精神），所有《讲话》的作者都认为，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成立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一种《讲话》中说：“革命刚一取得胜利之后，党立即建立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就其实质来说就是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首先是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最重要的政治条件。”（引文自译，下同——编者注）

首次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相当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最先开展的运动：“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运动”和“整顿和建设党组织运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四）。然而，在叙述中缺少整党具体实践和真实成果的资料。《讲话》的作者只列举了两个数字：一九五〇年年底至一九五三年六月的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吸收了一百零七万名新党员，在同一时期国内党组织的数目由二十四万六千个增加到三十二万八千个。没有关于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百分之十点五的党员被开除出党的资料。

《讲话》中对“高岗—饶漱石事件”的解释，完全是按照中共七届

四中全会的决议（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一九五五年三月）和毛泽东在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的官方说法作出的。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一九七七年刊登在他的《选集》第五卷中。

《讲话》根据上述文件对高岗、饶漱石进行了全面谴责，而补充的引证材料也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证实高岗、饶漱石似乎对党犯下了滔天罪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论证对他们所采取的处理措施是正确的。此外，还特别强调中共中央似乎多次给了高岗、饶漱石“认识错误”的机会，但是他们“不理解这一点并且顽固地坚持反党立场”，高岗更为恶劣，“以自杀表示了对党的最后背叛”。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决议》草案起草人谈话时说，“即使从今天的立场来看，关于高饶事件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定是人道的。”

事实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次冲突决非高岗、饶漱石“夺权”阴谋。

《讲话》对一九五三年底通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给予极高评价。重点是，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设独立的强大的国家的历史必然性。《讲话》的作者们认为，制定和通过这条路线的倡议人是毛泽东。

《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次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九月）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解释和评价基本上也是按照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议》精神表述的。

《讲话》中对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阐述值得特别注意，更确切地说就是这种阐述特别值得重视。

大家知道，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同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友好的标志下，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气氛和决议的影响下召开的。但是，《讲话》对实际上以一条红线贯穿代表大会所有文件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建设只是在同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密切合作下才有可能这一重要结论，却只字不提。

《讲话》关于苏中关系的历史只是泛泛地谈了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签订的苏中条约。《讲话》认为，这个条约巩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建设事业。

长春出的两种和济南出的一种《讲话》对条约有较充分的叙述，对条约的意义有较深刻的评价。只是在这几种《讲话》中提到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个主要工业项目。

所有《讲话》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中国建设最初几年经验的理论总结、特别是对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贡献。

《讲话》对毛泽东在该时期的活动没有进行直接批评。这种批评只是间接地表述在谴责思想运动，扣“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小集团”帽子的做法上，只是说“这是我们的教训”。把思想教育简单粗暴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地方党组织，而把历次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毛泽东置于批评火力之外。

过去的历史著作把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全部功绩都归于毛泽东一人。《讲话》与此不同，还提到了其他领导人，首先是周恩来和刘少奇。在那些年里，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措施的组织与推行，首先是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都同这些领导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讲话》还提到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林彪。

《讲话》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的第二个时期又细分成两个时期，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主要事件有：推行“大跃进”政策和建立人民公社，庐山全会（一九五九年八月）和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发动的反对彭德怀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所有当代的中国材料对“大跃进”都做了否定评价，并且认为“大跃进”和“同右倾作斗争”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挫折”。当代中国历史文献指出，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倾”使中共八大以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领域形成的好形势变坏了。

中国历史学家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一九五九年七月——八月）和中共中央庐山全会持批判态度。

当代中国历史文献有一个共同特点：努力把周恩来和陈云在这些年的活动区别出来，他们曾力争对在毛泽东的压力下通过的中共中央最不受欢迎的决定作一些修改。《讲话》指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改正”“大跃进”的错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改正错误是不彻底的，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工

作，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都没有进行到底。在会议上没有正式否定“盲目冒进”的方针，它又导致产生一系列新的错误。

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把“调整”国民经济的几年列为第二个细分期，官方把这个时期的开端定为一九六二年，但是几乎所有《讲话》都把这个开端定为一九六〇年中期。

尽管当代中国历史文献对六十年代前半期的经济“调整”，整个都做了肯定评价，但是一系列材料都强调指出，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农业和轻工业仍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

由于考虑到“大跃进”和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期间一些意识形态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消极后果，当代中国历史文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十年发展时期的评价是众说纷纭的。例如，一种《讲话》指出，在这一时期党“虽然遭受了暂时的严重的挫折，但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今天赖以进行现代化和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的一大部分是在那个时期建成的，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域中的一部分专家是在那个时期培养的，他们的工作经验也是在那个时期积累的”。正如今天所承认的，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五年中国共产党“得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吸取了某些教训”。《讲话》列举了那个时期犯的错误。

六中全会《决议》强调指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对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集体负责。同时还指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他的独断专行的作风逐渐破坏了中共内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个人崇拜的表现愈演愈烈。

中国历史文献在这个时期首先肯定地评价了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陈云、李富春、李先念、邓子恢的活动，否定地评价了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

所有版本的《讲话》几乎都没有谈中共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活动。没有一种《讲话》提到由中共领导挑起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的争论。对中共领导发表的针对世界许多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中包括针对苏共的文章都没有评价，在这些文章中把这些党宣布为“修正主义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上海、广州和济南出版的《讲话》中只是顺便提到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

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同时又指出，全会对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在其它版本的《讲话》中就连这样的介绍也没有。

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二月在北京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讲话》中占有显著位置。《讲话》指出，这次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历史中，甚至也是中国共产党整个历史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会议。中国的一些材料强调指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从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并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讲话》还提到一九七八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承认，他个人对“大跃进”时期的错误负责。沈阳、长春和天津出版的《讲话》中只是提到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但是没有具体说针对什么问题做了自我批评。

看来，在当代中国历史文献中对“文化革命”的分期还没有统一看法。例如，《讲话》根据六中全会《决议》把“文化革命”细分成三个编年时期：第一个时期——一九六六年至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四月）；第二个时期——中共九大至十大（一九七三年八月）；第三个时期——中共十大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在前面提到过的一篇文章中把“文化革命”只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第二个时期——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六年。

一些《讲话》的作者谈到“文化革命”的起因时指出：一九五七年以后，特别是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他的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给党的民主集中制带来越来越大的损害，个人崇拜日益严重，而党中央却没能及时改正这些错误。又指出，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利用了上述错误并且助长了这些错误。

《讲话》指出：“历史证明，毛泽东关于发动‘文化革命’的论点，不仅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具体现实。”作者们接着写道，在“文化革命”开始之后，这些错误论点陆续被系统化并上升为理论，变成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这一“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党纲的主要内容”被肯定下来。

所有当代的历史文献无一例外地承认，“文化革命”是毛泽东发动

的并且是在他个人领导下推行的。因此，他对“文化革命”及其狂热行动负主要责任。

《讲话》中极少，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有提红卫兵运动的由来，以及谁是这个运动的发起人，这个运动是怎样被控制和被利用的。

在所有《讲话》中极少提到“文化革命”的反对派。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议》和大多数《讲话》仅仅提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出现的对“文化革命”错误做法的“尖锐批评”，这场批评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叫做“二月逆流”。

分析当代中国历史文献表明，一些作者越来越多地试图把“文化革命”的狂热行动的责任转到所谓的林彪和江青、康生、谢富治、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反革命集团”身上，而不是由毛泽东来承担。

在一系列著作中，一些中国作者在叙述“文化革命”时极力强调毛泽东反对上述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行为的斗争，这一做法也很引人注目。

不能不指出，当代中国历史文献完全改变了对天安门事件（一九七六年四月）性质的解释。过去中国报刊报道了在天安门广场发出的对毛泽东的批评和示威者呼吁实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如今中国却说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是反对“四人帮”，捍卫邓小平和毛泽东。

《讲话》中一个突出的重点是，“粉碎林彪集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战线上的一些特殊成就。

中共党史最后一个时期（毛泽东逝世后）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决议》的框框写的。但是这个时期编年次序还没有明确确定。在一些著作中这个时期始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在另一些著作中这个时期始于一九七六年十月。看来，新时期的习惯计算日期最终还要定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即从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算起。

中国历史学家把这个时期又分成两个更细的时期：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含十二月，即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至今。有时还分出第三个时期——从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一九八一年六月）起。第一个时期是党在工作中动摇和徘徊的时期，其原因是“文化革命”左倾错误尚有残余和华国锋的错误领导。第一个时期最大的事件有：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四人帮”运动，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国

民经济的最初步骤。需要指出，对这一时期党内发生的过程的阐述是极其肤浅的：清除“左倾”、整顿等等。

第二个时期（至一九八一年六月）被说成是“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最大的事件一般都提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国民经济”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庆典及叶剑英在庆典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开始改革，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九八一年六月）及其决议。对于一九八〇年开展的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崇拜和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的广泛讨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八一年一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对外政策，则实际上都略而不提。所有著作都对一九七九年春对越南的所谓“自卫还击”给予特别注意，事实上这是对邻国无端的武装入侵。此外，一些著作指出，由于“自卫还击”，似乎使东南亚的局势稳定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按中国历史文献的说法，从中共中央六中全会起，开始了“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团结向前”的新时期。

整个说来，在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对近年来的中共党史都是按下列公式阐述的：揭露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九七六年十月），从严重的危险中“拯救了”党，使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由于华国锋的左倾错误和“文化革命”给国家造成的严重损失，党在自己的工作中遇到了巨大的障碍，这一情况造成了动摇和缺乏信心。宣布“文化革命”结束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也未能改变这种形势。华国锋在经济方面的错误造成了新的“盲目冒进”。按照中国历史文献的说法，华国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激起了领导干部的不满，特别是激起了党的老战士的不满。他们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他们要求正确地理解和完整地对待毛泽东“思想”及其纯洁化。中共中央三中全会是“伟大的转折点，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全会为全面克服“文化革命”时期和“文化革命”以前的“左倾”错误奠定了开端。这次全会通过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的战略性决议。随后在国民经济中开始执行调整的方针，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打倒的干部陆续恢复了工作。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促进了有利形势的发展，这次全会是“建立秩序和改正所有错误东

西的新的里程碑”。全会的决议证明，党的路线已经彻底得到纠正。

这样，当代中国历史文献对中共党史的叙述、说明和评价都是严格遵循中共官方文件，首先是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一些目前已经不再保密的党内文件和材料进行的。《中共党史讲话》的基本结论都是引自上述决议，实际上只有很少的补充和文字上的增删。实质上，这些《讲话》仅是用实际材料说明该《决议》。此外，《讲话》包含一定的补充材料，有助于更深入地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尽管新的从前未发表过的党的文件公开问世并供科学研究之用的数目很有限。这些文件往往只是提一下，或者明确一下何时、何地、为什么事通过的，但是没有分析，或者甚至连文件内容都没有简单披露。

《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共党史的叙述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历史完全割裂开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系谈得很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根本避而不谈。

（原载苏联《远东问题》季刊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中国：经济生活的问题

阿加福诺夫

与在中国进行的冠以经济体制改革名称的大规模经济改革有关的问题，在最近的官方文件中和中国报刊材料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调整农村经济关系开始的这场改革今天已扩展到城市工业、商业和财政领域以及价格政策。据官方人士和舆论工具承认，不仅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而且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都能感觉到所采取的措施的影响。

中国报刊公布的经济指标证明国家工农业有明显的起色，国民经济某些部门的生产在增长。据官方资料，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工业产值的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九，农业为百分之十点三，国民收入为百分之八点三。今年上半年，中国炼出二千三百万吨钢，生产一千八百万吨轧材，二千一百万吨生铁，发了二千亿度电。

近几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某些成就是经营管理条件逐步正常化和奉行经济“调整”方针的结果。这些成就主要是在传统的粗放制因素——

吸收新的劳动力参加生产、增加自然资源的开采量、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取得的。还有很大的内在潜力，其中包括没有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例如，机器制造业中达百分之三十的设备），也是起点不高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

一些中国作者在评价国民经济发展指标时主要强调的，首先就是广泛利用市场调节因素和鼓励私人主动性的效用。另一些作者则指出积极采用物质鼓励方法和扩大企业在财政、计划工作、灵活管理方面的权利的重要性。

同时，在许多重要文件和报刊材料中，表现出对今后经济发展前景采取谨慎态度的口气。这种谨慎态度是由与经济原因和其他原因有关的一系列情况引起的。

例如，增长的高速度正在中国引起某种担心，一些主要专家承认，国家经济对这种增长速度不是有准备的。这种担心最集中地表现在全国人大今年春天的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必须坚决制止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和在这方面进行竞争的做法。否则，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就会出现紧张局面，这又会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人民日报》在这方面说得更加严厉：高速度如果保持下去，那么其后果对国民经济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中国报纸在揭示这种情况时谈到国家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在发展上明显落后的基础部门薄弱，原料和动力不足，基础设施不发达，运输工作中有困难。供应工作有停顿现象。只要这些部门的状况不正常，其他部门的“跃进”将会造成经济的“过热”现象和经济结构中比例失调现象的加剧，换句话说，将会引起危机状况。

中国报刊还指出了与增长速度过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投资分散，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不平衡，以及由此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值得注意的是，诸如利用市场因素、管理权力下放、削弱计划工作等经济生活现象成为上述情况的主要促进因素。正象人大春季会议上指出的，“某些财政机关开始违反国家利益，彼此竞争提供贷款，而一些企业和行政组织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任意提高报酬，无限制地发放奖金和附加工资。所有这一切造成了银行贷款和消费基金的急剧增长，超出了正常的需求范围，流通中的货币多于需要，许多商品的价格大大提高了。”

《红旗》杂志在谈到这些现象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后果时相当坦率地写道：“……这些东西如果不及时制止，那么消费领域可能失去控制。这最终将导致价格的巨大上涨，对群众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引起经济生活中的混乱，我们也将不得不重新进行整顿，放慢改革的速度。”

在谈到消费基金增长不平衡时还要指出，这种不平衡的增长造成了一九八四年国家预算赤字的增加，达五十亿元，国家外汇储备减少二十亿美元（占总量的百分之一）。后者是由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增长没有得到相应商品的充实而引起的，而这又造成必须增加进口。

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报刊在有关改革进程的材料中从广泛显示成就转向比较冷静的口气并呼吁采取谨慎和慎重的态度。例如，《经济日报》不久前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和贫穷的国家，不可能转眼间变成繁荣昌盛的国家。”报纸在指出正在出现的困难时日益经常地写道：“所进行的改革尚未超出大胆试验的阶段，其正确性和结果只有在三、五年后才能充分让人们感觉出来。”关于拥有让人难以相信的收入的农户的文章日益减少，而关于福利的增长是一个长期的、不平衡的过程的文章日益增多。不久前新华社关于贫困家庭的报道在这方面是值得注意的。报道中呼吁要把对贫困人们的援助看作如同对发生自然灾害情况下的援助。

报刊还承认，中国有反对实行改革的某些势力，提到在改革掩护下实际上在破坏经济改革政策的人们。正象《人民日报》指出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某些地方、部门和机关不仅不够坚决地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和指示，而且还违背这些文件的规定，继续搞自己的一套，容忍有害风气的种种表现，给顺利进行改革带来危害。”

中国报刊这种引人注目的做法证明在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是多么严重，反映出由居民日益增长的财产上的差别和局面失去控制的可能性引起担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这方面引起人们的注意。文章对进行改革中的匆忙和考虑不周的现象提出警告，谈到必须仔细权衡经济措施的价值，牢记主要方针。“国营和集体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国营市场应起主要作用。而个体生产和非计划生产以及自由市场起辅助作用。”文章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今天已经到

了重要阶段。一方面，今年秋天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上将讨论一九八六至一九九〇年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和进一步进行改革的计划。另一方面，今年已开始价格改革——正如中国经济学家指出的，这是一整套经济措施的核心。事态将如何发展，将由时间来证明。而《人民日报》现在写道：“需要把经济生活的一系列现象引向正常轨道。”

（原载苏联《消息报》一九八五年八月八日）

三十年的中国

前塔社驻中国记者B·奥夫钦尼科夫

……飞机迎着夜幕飞行，好像要用其速度征服黑夜似的。凌晨三点天已开始破晓。蒙古不高的山岭被抛在了后面。下面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棕褐色平原，中间有一条笔直的黑线。我想这可能就是集宁——二连铁路线了。从前，我曾前往建设过这条横穿戈壁沙漠的干线，它途径乌兰巴托把莫斯科和北京用直达铁路连接起来。

荒无人迹的沙漠不见了。现在，平原宛如一块平展的镶木地板。它被划成一块块的田地。飞机下面闪烁着水库的波光。飞机就要在北京机场降落了。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看到三十多年前开始我的记者生涯的城市。我是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到北京的。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列车运行的天数比现在的伊尔—62式客机飞行的小时数还要多。我永远忘不了车站附近广场的情景：小贩的叫卖声、人力车的铃声和周围是齿状石头墙的前门楼。这些宏伟的城墙把内城及其皇宫建筑和花园同外城吵闹的街道分开，外城历来是中国首都的工商业区。

在从机场进城的路上，我眼巴巴地寻找着往昔的城墙轮廓，可是城墙已经不见了。只是在一座保存下来的有古老天文仪的城门楼上才辨认出了我曾经住过数年的地方。两旁种着槐树、杨树和柏树的公路干线变成了北京的主要街道——长安街。

前门城楼依旧位于中国首都的中央广场南端。我认出了北京火车站的旧建筑物（现在这里是铁路工人俱乐部）。四周则是我完全陌生的北京了。沿着拆除了城墙的地方盖起了一排现代化的住宅，都是十五层至

二十层。建筑物之间是一条装备路灯、设有地下通道和地下铁道站的六车道和大道。市内现在已经有两条地下铁道：环形线路和中心线路（后者和长安街一样，从东到西，横贯中国首都）。

在离天安门中央广场的不远处我们拐向了熟悉的北京饭店，确切一些说是拐向了新建的十八层北京饭店大厦。从我房间的平台上的可以从不寻常的高度鸟瞰北京城。有个时候，不准在中国首都兴建高过故宫的大楼。全城多半是平房。深墙大院使外人看不到宫内的生活，甚至也看不见那里生长的树木。如果站在高处则可以偶然看到树冠。

长安街上交通洪流中依旧有许多自行车。但是现在已经在人行道旁给自行车另辟了小路。其余的行车道全被汽车占用。国产二联公共汽车同地铁一样已成为北京人常用的城市交通工具，代替了过去到处皆是的人力车。

那么，从五十年代起，北京是否变了样呢？当然是变了样，不过还没有变到认不出的地步。郊区新建筑物拔地而起，内城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王府井商业街看上去几乎和先前一样（只是通行无轨电车）。宽阔的人行道上行人川流不息，看到人流的长河，你就会相信有关北京的故事也能与北京人挂上钩。

人们的面貌当然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不能说人群都改变了穿着。大多数市民依然穿着传统的蓝色或灰色干部服。如果有时看到鲜艳高领绒线衫、短衫、牛仔裤，则通常也是男女青年。追求时髦装束的基本上是青年，虽然不仅允许穿得漂亮，而且也鼓励穿得漂亮。电视广播员就以其穿着向人们表明了这一点。男广播员穿西服，打领带，女广播员发式时髦，身着连衣裙。

还记得，五十年代时，毛巾、搪瓷脸盆和带花暖水瓶是先进生产者自豪地向客人显示幸福的象征。自行车被认为是市民向往的东西。现在，在百货商店里可以碰到购置摩托车和电视机的农民。

由于想购买东西，赚钱的欲望就明显上升。家庭妇女在地铁车站和影剧院门口看管收费停放自行车的场地，在大街上卖茶水、瓜子等。就连北京的老人现在在大清早练武术时往往也充当收费教练。

这种经商气味已成为时代的某种标志。在商业广告渐渐代替了五十年代特有的直观宣传这一点上也感到了这种味道。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在北京饭店附近的十字路口上立着写有“抗美援朝”的标语牌，现